

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宋国友

[内容提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意识到全球经济失衡的不可持续性,并因此而力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增长。中国政府的科学发展观事实上与美国的倡议高度契合。在中美双边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全球经济平衡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但是,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会中断中美既有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未来的中美关系在经济、金融、贸易、汇率等领域面临着严重挑战。

[关键词] 经济相互依赖 全球失衡 平衡增长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

全球经济平衡增长(balanced global growth)作为美国政府提出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已经成为危机期间最为引人注目的词汇之一。无论是在G20峰会,还是在APEC等地区机制,或者是在中美首脑双边会晤中,平衡增长都构成重大议题。随着美国的强力宣传和推动,实现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也日渐成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广泛共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本次金融危机结束,平衡增长仍会被美国政府作为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关键政策而继续推进,这不仅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后果,而且会引发重大的政治后果,尤其是中美关系会因为平衡增长战略而发生显著变化。鉴于此,本文将在梳理美国与全球经济失衡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美国推动的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战略,以及中国对于这一战略的政策考虑。最后,本文还将深入探讨平衡增长下的中美关系未来。

一、美国与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是对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s)的一种纠正和调整。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是指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从经济指标来看,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间的贸易顺差/逆

差失衡、储蓄过剩/不足失衡以及国家债务/债权失衡。无论是哪一种失衡,美国都深深卷入其中。表1、表2和表3分别列出了全球经济失衡在上述三个领域的具体表现。

巨额贸易逆差被美国视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从1991年到2008年,美国国际贸易收支从接近平衡发展到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5%左右,在2006年甚至高达7.1%。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严重威胁着美国经济。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相对应的,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体所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

对于导致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一部分美国学者通过分析,认为其固然与美国民众没有节制的消费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全球国家储蓄过度

^{*} 本文为教育部“金融危机与中美金融关系研究”(09YJCGW003)项目部分成果。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较好总结,可参见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7-8页。

美国经常项目1991年为顺差29亿美元,到2006年逆差达8035亿美元,该年实际GDP为112948亿美元。数据来源: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9, pp. 284, 402; 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数据来自 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9, p. 186.

表1 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经常项目收支情况

(单位:亿美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发达国家	- 219	- 2203	- 4085	- 4589	- 3653	- 533
美国	- 5215	- 6311	- 7487	- 8035	- 7266	- 706
发展中国家	1496	2238	4483	6597	6645	7246
中东	559	968	2029	2626	2649	3453
东亚	851	929	1675	2880	4138	4239
中国	1239	1620	2016	2325	2563	2663

注:负数表示逆差。数据来源: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9, p. 186.

(global saving glut)以及相应的美国储蓄率过低。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该理论主张,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很高甚至过剩的储蓄,而全球过剩的储蓄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方式情况下,纷纷流向相对安全且资产易于流动的美国,压低了美国的银行利率,进而造成美国民众更愿意消费——包括从国外进口。这一方面导致美国储蓄率低,另一方面造成巨额的贸易赤字。金融危机后,这种理论在美国越来越有影响力。尽管对于全球储蓄失衡是否是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存在较大争论,但美国储蓄过低和部分国家和地区储蓄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2 美国及其他经济体的国民储蓄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发达国家	19.3	20.0	20.2	20.9	20.7	19.5
美国	13.9	14.5	15.1	16.2	14.5	12.6
发展中国家	27.9	29.7	31.5	33.3	34.3	34.8
中东	32.1	35.6	42.0	43.1	42.7	41.9
东亚	36.4	38.3	41.3	43.9	46.8	47.7
中国	42.1	46.1	47.5	47.9	49.9	51.3

数据来源:中国储蓄率2003-2007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小川行长2009年2月10日在马来西亚央行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关于储蓄率问题的若干观察与分析”,<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4200&D=276>,第7页;2008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分论坛四《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上的讲话:<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AFQLK00253GAD.html>;其他国家数据来自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9, pp. 196-197.

在美国,不仅民众超前消费,而且政府也在赤字中运行。在巨额预算赤字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通

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内外举债。

举债并非不可,但美国的问题在于借钱过多。到2008年年底,美国国债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其GDP的70%左右。2008年仅偿付这些国债的利息就花费美国联邦开支2489亿美元。在这些债务当中,美国政府对外债务超过3万亿美元。而借钱给美国的,主要是那些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东和东亚国家。

表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其他国家外汇储备

(单位:亿美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69980	75961	81704	86802	92292	106998
美国政府外债	15231	18493	20339	21031	23532	30769
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	13637	18154	23112	30818	43784	49625
中东外汇储备	1993	2485	3577	4911	6956	8259
东亚外汇储备	6711	9358	11578	14915	21316	25377
中国外汇储备	4032	6099	8188	10633	15282	19460

数据来源:美国债务数据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官方网站 <http://www.treasurydirect.gov/govt/reports/pd/mspd/mspd.htm>, <http://www.treas.gov/tic/mfhhis01.txt>;中国外汇储备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统计数据与报告:中国历年外汇储备”;其他国家数据来自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9, p. 194.

二、美国政府的全球平衡增长战略

虽然此前一些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就提出全球经济失衡这一概念,并且认为这种失衡对美国利益以及全球经济都将是一种严重损害,而且MF也

Ben S. Bernanke,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 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5/200503102/>.

理查德·库珀:“理解全球经济失衡”,《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2期,第17页。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现任主席伯南克都曾宣称全球储蓄失衡是导致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强调这一观点。参见:Alan Greenspan, “The Fed Didn’t Cause the Housing Bubble”,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3672965066989281.html>; Ben S. Bernanke, “Remarks on the economic outlook”,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bernanke20080603a.htm>; Paul Krugman, “Revenge of the Glu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9.

认同这一观点,指出全球不平衡难以持续,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但由于一方面当时美国经济发展较好,另一方面扭转失衡现象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策来干预市场选择的自然结果,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对此并不特别热衷,所以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讨论更多地是局限在学术圈,而没有产生重大的政策影响。

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国总统的换届选举从经济现实和政治条件两方面使得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成为新一任美国政府的优先战略选择。奥巴马上任不久,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再也不能继续依靠旧有的超前消费模式和过度举债模式来发展经济,因为这样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在金融危机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他再三强调美国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必须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而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不仅是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未来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美国政府的平衡增长战略包括内外两部分。内部平衡旨在改善美国政府收支情况,这“意味着增加储蓄和节约开支,降低我们的长期赤字”。为此,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医疗改革,减少未来政府支出;宣布施行新的养老金方案,以此提高美国居民储蓄;要求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以确保未来金融市场的稳定并以此吸引外来资本。

但仅有内部平衡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可能单独实现的。美国政府深信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美国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外部动因,因此也只有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才可以真正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平衡增长。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奥巴马总统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作为对外经济战略的主要突破口。而诸如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等主要经济智囊、财政部长盖特纳等政府经济政策决策部门行政官员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货币政策制定者,同样是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拥护者和鼓吹者,更不用说国会在此问题上的肯定立场。可以不夸张地说,推动全球平衡经济增长绝非美国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其力图“变危为机”所进行的重大战略抉择,它获得了美国政界和学界精英的广泛支持。

为了实现全球平衡增长,奥巴马政府抓住各种重要机制加以推动。G20峰会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国际多边平台。美国政府利用举办匹兹堡 G20峰会的机会,成功地把“平衡增长”这一倡议作为会议重要成果放入领导人声明中,让其他国家同意并接受美国的这一政策主张。在新加坡召开的 2009 年 APEC 首脑会议同样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努力,一份名为《新增长模式》的领导人声明强调了 APEC 国家要致力于寻求“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

这些平台虽然重要且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它们更多的只是政策表达窗口,不能产生即刻的政策效果。因此,美国政府除了充分利用各种国际机制之外,还制定了服务于全球平衡增长战略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希望通过这两大直接联结美国与国际经济的传递渠道来有力地缓解其经济失衡的核心指标——对外贸易巨额逆差。

在贸易政策领域,奥巴马政府着眼于减少贸易逆差而采取了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美国行政当局这样做并不主要是被动屈服于国内利益集团或者国会的政治压力,而是在其平衡增长战略指引下的主动政策选择。奥巴马在接受 CNN 采访时曾经明白指出,为了实现“更为平衡的全球经济”这一目标,“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中国、德国或者其他国家只向我们出口各种东西……而我

Rodrigo de Rato, “Correcting Global Imbalances: Avoiding the Blame Game”,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05/022305a.htm>.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萨默斯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指出:“如果要想我们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安全无恙,朝向一个更为平衡的全球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参见 Lawrence H. Summers, “Shaping the Next Economic Expansion”, October 29,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administration/eop/nec/speeches/shaping-the-next-economic-expansion> 盖特纳也认为:“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促进我们自身以及世界经济的持续扩张,但这样的扩张必须是更为平衡的。参见 Timothy F. Geithner, “Remarks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Washington”, <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tg97.htm>.

“US wins G20 backing for growth pla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3, 2009.

Statement by APEC Leaders, Singapore, 14 - 15 November 2009, http://www.apec.org/apec/leaders__declarations/2009/aem_growthparadigm.html

们不向他们出口任何东西的年代”。

在汇率政策方面,尽管美国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一直表态支持“强势美元”,但政府实际上实施的是强势美元口号下的弱势美元政策,即在不影响美元世界基准货币的基础上乐意让美元贬值而不采取措施加以阻止,这同样是为了促进出口、进而实现平衡增长战略。因为围绕具体商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于减少贸易逆差只能发挥“点”的作用,而不断走低美元汇率能够在“面”上带动美国货物及服务商品的对外出口。

三、作为中美共识的平衡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东亚,特别是中国位于美国全球平衡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位置。正如表1、表2和表3所揭示的,如果说美国居于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端,那么中国则恰好处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另一端。因此,中国构成美国全球平衡经济增长战略的关键。很多美国官员对此也并不讳言。在他们看来,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超高的国民储蓄率,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等等,都是造成全球经济以及美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为此,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劝说或者迫使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增长以及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平衡做出必需的贡献。

从中国的现实政策反应看,对于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它是美国所希望的就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事实上,中国也逐渐接受并且认同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对于中国本身以及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本质上美国所提出的平衡增长和中国政府一直所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之间存在目标高度相似之处。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全球经济失衡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内经济领域的结构问题和发展方式问题——例如国内消费率过低以及出口比重过大等——确实不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美国此时提出平衡增长战略,恰恰可以作为一种外部压力被中国用为进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

在平衡经济战略方面,中国对美国的真正不满主要有三点。其一,美国试图把全球经济失衡归罪

于中国,甚至认为是中国“蓄意而为”,从而推卸属于自己的根本性责任。其二,美国更多地要求中国单方面采取措施来实现平衡,而不愿意自身努力进行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其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美国不是进行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而是过分采取单边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和不负责任的汇率政策。因此,中国政府也坚决地利用各种多边的和双边的重要场合表达了对美国政策的严重不满,并且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切实措施首先从自身做起,平衡经济发展。

除上述三点外,中美在全球经济平衡增长方面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对立与分歧。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或者是在奥巴马总统访华的《联合声明》里,平衡增长都能够作为双边对话的重要成果被列出。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其说是中美之间的妥协产物,不如说是中美两国的战略共识。

中美双方不仅在政策表态上对于平衡经济增长存在共识,而且在政策实践中总体上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依照前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指标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通过中美双方的政策推动,两国不仅各自的失衡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对对方的失衡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在最具标志性

“Balancing Act Mr. Obama's wise message for the Group of 20”,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09.

美国对中东国家的贸易逆差同样受到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但这种逆差主要是美国从该地区进口大量必需的石油等能源产品所导致,同美国与东亚之间的商品逆差有显著不同,因此不能通过贸易保护政策予以减少。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推动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来降低对中东石油的需求,进而减少对中东国家的贸易逆差。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在回应谁应该对当前的金融危机负责时,温家宝总理表示:“这次金融危机始作俑者是某些经济体自身经济的严重失衡,主要是长期的双赤字,靠借债保持的高消费。对一些金融机构,长期失去有效监管,使他们利用高杠杆率来获取巨额利润,一旦泡沫破灭,灾难就留给了世界。”参见“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2/02/content_10753101.htm.

《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关于中美经济、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合作”部分,第一条即为“中美两国将各自采取措施促进国内经济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而《联合声明》中不仅明确提出“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而且中方承诺“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美方承诺“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的贸易收支失衡方面,效果最为明显。从中国对外出口看,2009年1-10月份,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为1592亿美元,相对于上年同期同比下降27.2%。而在相同时段里,美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3039亿美元和6109亿美元,同比减少幅度达50%。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分别通过顺差减少和逆差减少两个方向较明显地缓解了全球贸易失衡,朝着平衡方向发展。

同样,从中美双边贸易收支指标看,情况也有了一定的改善。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09年1-10月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88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2250亿美元减少了366亿美元。在平衡储蓄率方面,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明确表示中国官方降低储蓄率意图明确。而美国国内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在这一领域更是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以美国最为外界所诟病的个人储蓄率为例,2009年1-10月份美国这一指标平均为4.55%,比2008年同期的2.55%已然增长了两个百分点,2009年4月份甚至达到了16年来的最高(6.4%)。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美之间当前这种朝向全球经济平衡以及彼此之间平衡的现象并不是金融危机之下的暂时现象,而是未来的一种长期发展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前金融危机已警示人们,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需要内在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平衡增长战略以及中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认同立场,有着战略上的强力推动作用。在市场和战略的双重作用下,未来全球经济朝向平衡增长以及中美之间趋向平衡的大趋势会持续下去。以贸易收支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计,到2014年,中国外贸顺差占GDP比重将在2008年9.8%的基础上逐步回落至8.4%;而美国贸易逆差在2008年占GDP的比例为4.9%,2009年为2.6%,2010年为2.2%,2014年为2.7%。可以肯定,与两国对外贸易走向相对应的,将是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减少。同样,未来两国在储蓄率方面的表现也是如此,作为一种趋势,中国的储蓄率会下降,而美国的储蓄率将上升。

毫无疑问,反映在贸易和储蓄等领域的平衡增长趋势将会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现有格局。但其影

响不会仅限于经济领域,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也会因此被深刻塑造。

四、平衡增长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美两国首脑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也从小布什时期的“坦诚、建设、合作”提升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全面和合作”。在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双方都承认共同利益是最为关键的动力。最为关键的合作领域有两个。一是地区或者全球议题,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二是全球化下所形成的中美经济深度依赖。如果说前者是基于第三方的“外生性”共同利益,而后者则是植根于两国之间的“内生性”共同利益。特别是后者,事实上起了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

然而,对当前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甚至是“不健康的”经济相互依赖,带有深深的全球经济失衡烙印。简言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一种失衡而非平衡的相互依赖。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看,主要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需要。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离不开对美国出口。尽管最近几年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和贸

中国商务部:“商务部通报09年1-10月我国商务工作运行有关情况”,http://www.gov.cn/gzdt/2009-11/16/content_1465637.html

美国统计署: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storical/exhibit_history.pdf

美国统计署:<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top/dst/2009/10/deficit.html>;<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top/dst/2008/10/deficit.html>

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http://www.pbc.gov.cn/detail.asp?col=4200&D=283>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数据<http://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data/PSAVERT.txt>

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ustaining the Recovery*, October 2009, pp. 187, 190.

关于中方高级官员的表态,可参见杨洁篪:“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之源”,中新社北京2009年10月22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10-22/1925945.shtml>;关于美方高级官员的表态,可参见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2005年9月21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

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2页。

易顺差国。然而对美国而言,在现阶段,美国固然希望扩大对华出口,但并不依赖中国市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中国资金的需求,希望中国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以弥补其巨额财政赤字。中国在过去几年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确实也大为增加,直至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外国政府债权人。但同样,中国并不依赖美国的资金。

过去几年,正是这种两重失衡的单向依赖交织在一起,从“中国依赖”和“美国依赖”这两个角度共同形成了中美之间无法割舍且大致对等的经济相互依赖,并铸就了所谓的中美经济共生格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平衡增长的努力,最终可能会摧毁这种相互依赖模式。

美国平衡增长的核心目标是要减少国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和降低财政赤字、减少贸易赤字,增加出口。中国平衡增长的目标是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这些目标如果得以实现,中美上述经济相互依赖模式将难以为继。从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看,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需求减少导致从中国进口商品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政府致力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将促使国内消费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届时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将会大为降低。而就美国对中国的资金需求而言,美国国内储蓄率的增加、对外贸易逆差的减少以及联邦政府控制预算赤字的努力,意味着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再那么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购买其国债,因此国债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到时也将会萎缩。

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原有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催生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共生格局。恰恰是这种看似难以推离对方的“共生”性相互依赖,不仅维系了中美之间的稳定与合作,而且引发了颇具创意的中美两国“共治”设想。甚至可以预见,不管喜欢与否,如果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继续下去,经济方面的“中美共同体”(Chimerica),或者政治方面的“两国集团”(G2),未必没有实现的逻辑基础。事实上,如果把中国和美国视为一个跨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体,而非两个主权国家经济体,中美之间的经济分工堪称完美典范。在这样一个“经济

体”中,没有显著的贸易逆差或者外部债务困扰,大体上能够共同发展。

但现实是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有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国家,只能首先考虑——如果不是仅仅考虑——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平衡增长战略,已经被两国共同视为推动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两国经济的平衡增长继续下去,中美两国以往熟悉的基于贸易-国债(Trade for T-Bill)互换所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将逐渐消逝。长远来看,中国将不再像现在这样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也不再像现在这样依赖中国的资金。中美两国或许可以为之庆幸,因为两个大国在很大程度上都因此摆脱了因为对对方的需要而不得不面临的经济乃至政治束缚。但必须意识到,这同时也意味着两国事实上失去了牵制对方的最为有效手段——美国将无法继续再以其国内市场为筹码压迫中国做出政策调整,中国也不能以国债为武器暗示美国照顾中国的利益。

这对中美两国独立外交可能是好事,但很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风险。如前所述,中美关系主要靠基于第三方的共同利益和双边内部共同利益来维系。地区或者全球性外部利益固然能够促成中美之间的合作,但很难想象中美这样两个大国竟然一直需要外部议题来维持合作,两国在国际或者地区议题上的合作应该是一种有益补充,而不能根本上取代两国之间的“内生性”共同利益。况且,这种外部利益不会永远存在,它具有时间短暂和议题变动两大特征。逻辑上,必定会出现中美关系外部共同利益的缺乏期或者断层期。因此,中美关系如果要真正稳定,必须要寻找内在的、双边的牢固纽带。这种纽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失去了外部共同利益的维系,也不会让中美关系轻易遭受冲击。

截止到2009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为7989亿美元,居第一位(<http://www.treas.gov/tic/mfh.txt>)。

中国对美国的资金需求主要表现在FDI方面,但来自美国的FDI并不在中国吸引的FDI中占据重要地位。2008年美国对华投资只有29.44亿美元,在中国外资来源地中列第七位。参见商务部:“2008年1-12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v/200902/20090206021530.html>

国内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参见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22页。

失衡经济下的相互依赖恰是过去几年两国真正倚重的,它通过无法承受的损失这一消极因素积极抑制了双方可能的战略对抗性冲动,从而真正扮演了双边关系“内在稳定器”的角色。而中美双边的其他关系,无论是军事关系还是意识形态,在现阶段或者可以预见的将来,更多的是冲突性诱因,而不是合作性因素。

现在,中美以往那种看似牢不可破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正在遭遇瓦解。尽管中美当前的经济相互依赖因为既有模式的强大惯性而无法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根本“脱钩”,但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外部触动以及中美双方共同的政治决心和现实的经济压力之下,前述中美两国在贸易、储蓄率等方面最近一年的变化已经清晰地显示双边经济关系的“解扣”过程不仅已经缓慢发生,而且将会不可逆转地继续发展。失去了足够牢固的双边关系维系“铰链”,这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美关系当然没有脆弱和敏感到一失去经济相互依赖就马上出现剧烈波动的程度,况且,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中美原有相互经济依赖模式即使消失,双方也不会彻底“脱钩”,在经济领域还存在着其他程度不一的相互需要,比如,美国市场仍然是中国出口的重要方向,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会不断增加。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相互需要的重要性和互补性相较于原有的经济相互依赖都将大为降低。这将直接导致中美关系的风险加大。在新的足够重要的双边共同利益或者经济相互依赖模式建立之前,中美关系很可能会在失去内在稳定器的情况下出现动荡和冲突。

五、结语

不管作为是主动为之还是被动应之的结果,过去中美两国各自的增长模式已经很难持续下去,必须通过平衡增长的方式加以根本性地调整。但平衡经济增长对于中美两国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对美国,它更多意味着战略收缩。减少进口这一政策事实上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准备也没有能力再如以往那样无限制地接纳其他国家的出口。非但如此,它还必须更多地向世界出口。

而为全球提供市场并且承担一定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霸权国必须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现在美国无法承担起这样的公共产品。世界,特别是那些对美国有着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对美国的需求不得不降低。

而中国扩大内需、减少出口的平衡经济战略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事实上赋予了中国成为更独立经济大国的机会,中国将依靠本国14亿人口实现内部经济发展,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过多地依靠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甚至更多地进口时,就预示着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向全球经济体系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世界将会从中受益并且开始依赖中国。若果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将会更加不可动摇。

对中美关系来说,平衡经济(balanced economy)的实现最终会促成均衡大国(balanced power)的到来。两国不仅在双边关系中更为平等,而且对全球影响也会趋向对称。这其实意味着中美关系过去那种特殊关系的终结,两国将被迫回到大国政治常态。毫无疑问,这对中美双方共同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双方都必须意识到,平衡经济增长将导致中美的原有经济相互依赖模式很大程度上的退潮甚至消解。而在中美达成新的相互依赖模式之前,两国要经历痛苦甚至危险的内外调整与彼此适应。因此,两国未来需要谨慎管理缺乏经济相互依赖情况下的双边关系,避免经济平衡导致战略失衡,防止任何一方的不当战略行为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冲击,甚至造成中美双边关系的毁灭性脱轨。同时,中美要积极寻求平衡时代新的经济相互依赖方式,尽快彼此开放市场,真正通过市场相互依赖来努力促成中美经济关系新的互嵌,以期继续维护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张浩)

如果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中美当前经济相互依赖模式产生的开始年份,那么迄今为止这一过程大致用了8年时间。